

金
簡
中
巾

所
开

究
力

第一輯



簡帛研究

第一輯

李學勤 主編 林劍鳴 謝桂華 副主編

法律出版社
·北京·

(京)新登字 080 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簡帛研究/李學勤主編.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3. 8

ISBN 7-5036-1397-1

I . 簡…

II . 李…

III . ①簡(考古)-研究-文集 ②帛書-研究-文集

IV . K877. 5

法律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宣武區廣內登萊胡同 17 號)

冶金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9.5 插頁: 4 頁

字數: 251 千字 印數: 1—500 冊

定價: 13.00 美元

主編：李學勤
副主編：林劍鳴 謝桂華
責任編輯：彭錦華
封面設計：李生侖

前　　言

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多次古代文物的發現，特別是文字材料，對學術的影響尤為深遠。其中時間最近的是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包括著名的殷墟甲骨，樓蘭、敦煌等簡牘和敦煌卷子，震動了海內外的學術界。本世紀二十年代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發軔以後，田野工作收穫甚多，近二十年來重大發現更是層出不窮，令人目不暇給。以前王國維先生曾稱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為“發見（現）時代”，現在可以說我們當前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大發現時代”。

上述殷墟甲骨、樓蘭等簡牘及敦煌卷子的研究，都早已成為專門的學問，據有重要的地位。七十年代以來考古發現中可與之相埒的，是各地出土的大量簡牘、帛書。簡帛前此也有發現，如 1930 年的居延簡、羅布淖爾簡，1942 年的長沙子彈庫帛書及五十年代的幾批楚簡等等，但都沒有近年出土的那麼豐富和集中。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內容上，新出簡帛都超越了過去。

新出簡帛的研究，業已從多方面推動了學術的發展。在這裏，我們祇能舉出少數幾個例子。

1972 至 1974 年，居延新發現漢簡近兩萬支，即學術界所艷稱的居延新簡。經過一段時期的整理和考釋，現在已有《居延新簡》、《居延新簡釋粹》等書問世。這批新簡與 1930 年的結合起來，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漢代西北邊郡的制度和狀況。新簡的探討不僅導致對所有居延簡的重新研究，而且帶動了整個邊遠地區漢晉簡的研究工作。

1973 年，長沙馬王堆 3 號墓出土大批帛書及竹木簡，內容多屬珍秘佚籍。這座墓葬於漢文帝前期，帛書的寫成有的可能早到秦或漢初。《馬王堆漢墓帛書》預定共 6 冊，現已出版一半，另外還有不少材

料分別發表。其中如《周易》經傳和通行本大有不同，對《周易》研究極有裨益；《老子》乙本卷前佚書恐即《黃帝四經》，揭示了久已失傳的黃老之學的真相；《五星占》和《天文氣象雜占》是科學史的珍貴材料，說明當時科學知識的進步；《五十二病方》與卷前佚書，對中醫學理論和歷史的探索又有特殊的意義。諸如此類，難於縷述。

1975年，雲夢睡虎地11號墓出土簡約一千二百支，這是首次發現秦簡，從而消息不脛而走，引起學者們廣泛重視。簡的中心是秦律，還有與之相關的《律說》（發表時題《法律答問》）、《封診式》等。由於內涵涉及當時社會的許多方面，能够彌補文獻的不足，釋文一經公布，便有很多學者撰寫論作，至今每個月都有研究秦簡的作品出現。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一發現從根本上改變了秦史研究的面貌。1989年，在雲夢龍崗再一次發現了秦律竹簡。

1983和1988年，江陵張家山247號、336號墓先後出土了漢律竹簡。前者包括《二年律令》和有關的《奏讞書》，釋文最近即將發表。247號墓年代是呂后時期，“二年”就是呂后二年，所以這些律令最適於同秦律聯繫對比。張家山簡漢律的刊佈，一定會使這一時期歷史的研究進入新的階段。

這樣幾個例子，已經足夠表明簡帛研究的重要意義，同時也告訴我們，今天簡帛研究是學術界迫切需要的一門新興學科。簡帛研究的開展，會對很多學科有重大而且深遠的作用。事實上，這一學科是羽毛豐滿的，只要看每屆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年會都有大量這方面的論文，每本《中國考古學年鑒》都為簡牘、帛書論著目錄設有專欄，就能有足够的認識。

中國簡帛的研究，也受到外國漢學家的充分注意，有關論著很多。對國內的新發現，外國學者迅速作出反應。例如1976年春，雲夢睡虎地簡的消息剛在中國報端披露，日本《讀賣新聞》等幾大報紙立即報導，隨後就有不少學者撰文研究。在美國，還特地舉行過關於馬王堆帛書的工作會議。中外學者間的往來交流，也是相當頻繁和普遍的。

因此，我們迫切需要為簡帛研究開闢一處專門的園地。現在呈獻在大家面前的，是我們嘗試邁出的第一步。首先需要說明的，我們在標題上採用了“簡帛”字樣，是想強調內容兼顧各種簡牘和帛書。我們希望這一園地的範圍儘可能廣闊一些，使各方面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能自由地參加進來。學科越分越細是目前學術的一般趨勢，但越劃分，也就越有彼此溝通融會的必要。同一問題的商榷討論，更能促進研究的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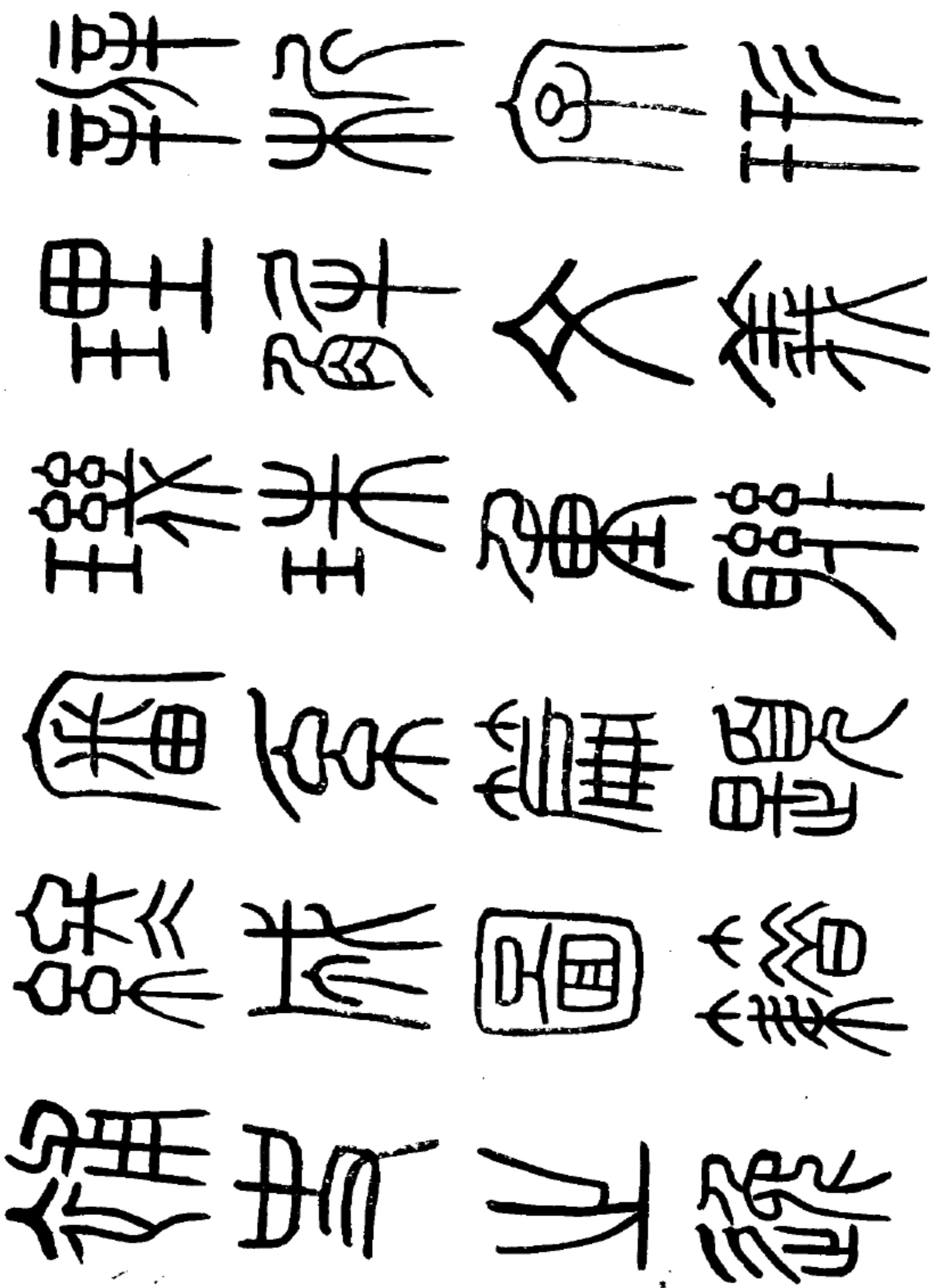
簡帛研究是十分務實的學問。一支簡、一片帛的綴合，一個字、一句話的解釋，每每要耗費很大的功夫。新發現的簡帛這樣衆多，整理發表便要投入很多人的精力心血，更不要說深入研究了。歷史上發現的簡，如西漢的孔壁中經，西晉的汲冢竹書，直到如今也沒有研究完畢，其對學術的影響仍然存在。新出簡帛很多還沒有發表，有的雖已刊佈，但還沒有人仔細研究，今後新的材料必然又將不斷湧現。看來簡帛研究的前景是非常遼闊的。相信只要我們共同努力，《簡帛研究》會繼續出版下去，對學術的振興發展有所貢獻。

懇切期待各位讀者能對《簡帛研究》提出批評和意見。

李學勤

1993年5月

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大易 博学書



簡

帛

研

究

遺書題



目 錄

前言	李學勤	(1)
簡牘學與歷史學	何茲全	(1)
湖北楚簡概述	陳振裕	(4)
包山楚簡研究二則	劉彬徽	(12)
讀簡帛文字資料札記	裘錫圭	(26)
秦漢簡帛與秦漢史研究	魯惟一著 張書生譯	(34)
讀秦漢簡牘札記	高 恒	(40)
秦《戶律》和《具律》考	彭 浩	(48)
睡虎地秦簡《日書》“反支篇”及其相關問題	劉樂賢	(56)
從放馬灘《日書》(甲種)再論秦文化的特點	林劍鳴	(62)
雲夢龍崗秦代簡牘述略	梁 柱 劉信芳	(74)
馬王堆帛書《周易》 ——兼談湖南出土的八卦紋銅鏡	周世榮	(79)
馬王堆《刑德》乙本九宮圖諸神釋 ——兼論出土文獻中的顓頊與攝提	饒宗頤	(89)
帛書《刑德》略說	陳松長	(96)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城邑圖”及其有關問題	徐蘋芳	(108)
談銀雀山簡《天地八風五行客居五音之居》	饒宗頤	(113)
再論“檢”	大庭脩著 徐世虹譯	(120)
新舊居延漢簡冊書復原舉隅(續)	謝桂華	(145)
漢簡遣書考述	李均明	(168)
漢簡所見邊郡軍事與民政系統的職權關係	徐樂堯	(173)

“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考	永田英正(177)
甲渠塞臨木部候長考——兼論候長的職責	劉軍(184)
漢代邊塞軍隊的給假、休沐與功勞制 ——讀《居延新簡》札記之二	邢義田(192)
“居延新簡”商榷	馬先醒(206)
居延“愚吏”簡校箋	魏啟鵬(212)
敦煌馬圈灣漢簡中的一組律令冊	吳初驥(215)
敦煌新出簡牘輯錄	何雙全(221)
西北新近發現的漢代行政文書	
絲綢之路與漢塞烽燧	岳邦湖(254)
定縣八角廊漢簡儒書小議	李學勤(257)
簡帛研究動態	
首屆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東山(266)
附：首屆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	
目錄	(270)
馬王堆漢墓國際學術討論會述略	陳松長(274)
漢簡研究國際學術會議概況	陳波(283)
懸泉遺址發掘又獲新成果	柴生芳(287)
懸泉置發掘結束簡牘整理即將進行	玄權(290)
後記	謝桂華(291)

簡牘學與歷史學

何茲全(北京師範大學)

近七十年前(1927)，蔡元培和傅斯年等人創建歷史語言研究所時，傅斯年在所寫《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強調“近代的歷史學祇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他認爲：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他把有沒有新材料、新方法、新工具對一門新學問的關係，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他極推崇顧炎武和閻若璩，他說顧亭林“搜求直接的史料以訂正史文”，閻百詩“以實在地理訂古載”，說他們這種搜尋金石刻文以考證史實，親看地勢以察古地名的精神和所走的途徑，爲我們立下了不朽的遺訓。

他對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定的任務，是尋“求新材料”。他所謂的新材料，具體的說就是新發現新出土的簡牘、文書、甲骨和金文。他要求史語所的工作，第一步是沿京漢鐵路綫，對燕都故都、安陽殷墟進行發掘，尋找新材料；第二步洛陽；第三步從洛陽西行，西安、敦煌、吐魯番、疏勒到中亞細亞。凡此所爲，都在尋求新材料。他重視材料，重視新材料，“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這仍是史學即史料學那一套。

“歷史學祇是史料學”，這是錯誤的。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是人類古

往今來的社會，古往今來的社會歷史。歷史科學的任務是：實事求是的探討人類社會的客觀真實，在認識客觀真實的基礎上認識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人類社會歷史既然是有規律的，歷史學在認識了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後，就可以鑑往知來，給人以預見歷史發展方向的可能性。這是歷史科學的任務。

歷史，已經過去了。人們研究歷史、認識歷史，祇有靠文獻，靠史料記載。文獻、史料記載，是會有錯誤的。錯誤可能來自執筆人的偏見，可能來自私心，可能來自誤傳未接觸實際，可能來自階級局限性，可能來自時代局限性。總之，歷史記載，史料，會有錯誤。為了弄清歷史事實，就須要對史料進行考訂，就要研究史料。這也是史學。但這離“歷史學祇是史料學”相距至少有十萬八千里。

人類對客觀社會的認識，主要來自實踐。實踐越豐富、越提高，人類認識客觀社會的能力就會越高，對客觀社會的認識就會越深刻，人類對當代社會認識越深刻，對社會歷史的認識也就會隨之越深刻。人類對社會歷史的認識，最根本處也是來自實踐。不斷的實踐，反復總結、提高，建立起認識社會歷史的能力。這樣的高度洞察社會歷史、認識社會歷史的能力，才能產生歷史科學。歷史學不是史料學，史料學產生不了歷史學。

我們說歷史學不是史料學，是要擺正它們的關係，決不是輕視史料，更不是輕視新史料。歷史學雖然不就是史料學，史料對於歷史，對於研究歷史，發展歷史科學，畢竟還是頭等重要的事。沒有記載，沒有史料，歷史科學是建立不起來的。沒有史料，歷史研究就無法進行。

從這個意義上說，史料仍是重要的。尋求新史料更是重要的。多一分材料，就多一分尋求歷史真實的依據。依據越多，歷史真實的可靠性就越大。尋求新材料，發現新材料，是史學研究的頭等大事。但這和“歷史學祇是史料學”無關。

簡牘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新材料。簡牘對研究漢代歷史的重要，就如金文、甲骨文對研究商周史的重要。

簡牘學包括兩部大學問，一是簡牘本身的整理研究，一是以簡牘

爲材料開拓中國史的研究，這是簡牘的使用。狹隘的簡牘學，也可以說祇是簡牘本身的整理和考訂。但簡牘學不能離開歷史學。沒有歷史知識就沒法對簡牘進行整理和考訂。說重一點，沒有歷史知識，就沒有資格對簡牘進行整理和考訂，勉強去作，必然是事倍功半，作不出好成績。反過來對一個歷史學家來說，也是一樣。不研究簡牘，不掌握簡牘，祇想吃現成飯，等搞簡牘的把簡牘整理出來自己使用，自己的史學研究境界就定然受限制。

在這個意義上，簡牘學和歷史學是一家，簡牘學家和歷史學家是一家人。

存世的歷史文獻是有定數的，地下埋藏的甲骨、金文、簡牘卻是無限量的，可能是極豐富的。中國歷史學的開展，有賴於地下埋藏的簡牘。

傅斯年的“近代歷史學祇是史料學”是錯誤的。但他重視新材料，重視考古發掘，把史學的進步和退步完全繫在有無新材料上，這精神、這氣魄是可佩的。今天我們應有更大的氣魄更高境界的認識。在簡牘學和歷史學是一家的認識下，發掘新材料，開展史學研究，開展簡牘學研究。

湖北楚簡概述

陳振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中國成立後，隨着科學的考古調查、發掘工作的開展，發現了大批城址、遺址、墓葬等楚文化遺存，出土了豐富多彩的、數量衆多的楚文物，積累了大量的實物資料。使人們對獨具特色的楚文化有了更多的瞭解，並掀起了楚文化研究的熱潮。

楚文化的研究，雖然自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已開始古器物的研究，但自建國以來大量考古資料的積累，許多學者首先是建立東周楚墓的年代學系列；爾後又將楚文化遺存、楚文物與歷史文獻相結合，進行楚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研究，並取得了許多可喜的成果。當然，在楚文化研究中，由於楚國史書早已佚失無存，因而學者們對於記有當時楚國歷史文化等方面一些情況的簡帛資料，自然更為珍視。

目前已發現的戰國時期的楚國竹簡，以湖北出土的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對於研究楚國的歷史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因此，本文僅就湖北楚簡發現的情況及其主要內容，作簡要的概述。

一、發現概況

東周時期的楚國竹簡，主要發現於湖南、河南和湖北等三個地區。最早的考古發現是 1951 年冬至 1952 年春在長沙五里牌 406 號墓出土一組內容為遣策的楚簡^①。1953 年，在湖南長沙仰天湖發現一組內容為遣策的楚簡^②。關於長沙楊家灣六號墓出土的一組竹簡^③，過去均認為是戰國時期的楚簡，但從陶薰等隨葬器物分析，其年代應為西漢初年，故本文未將其列為楚簡。1957 年，又在河南信陽長臺關

一號墓發現兩組竹簡，第一組的簡文內容為一部竹書，第二組的簡文內容係遺策^④。1980年，還在湖南臨澧九里一號楚墓，發現一組內容為遺策的楚簡^⑤。另外，1984年在湖南常德德山和1987年在湖南慈利石板村M36發現兩批楚簡。

湖北發現戰國時期的楚簡，是從六十年代開始的。1965年12月，第一次在江陵望山一號墓首次發現一組簡文內容為卜筮祭禱的竹簡；第二次是1966年元月，望山二號墓又出土一組簡文內容為遺策的楚簡^⑥。這兩組簡的數量較多，但保存較差。1973年，在江陵簾店一號墓發現一組遺策內容的楚簡^⑦，保存很差，殘存二十四枚。1978年，在江陵天星觀一號墓發現二組竹簡，一組簡文內容為卜筮祭禱，另一組簡文內容為遺策^⑧。1978年，還在隨州曾侯乙墓出土一組內容為遺策的竹簡，共二百四十枚，計六千六百九十六字^⑨。1981年5月，在江陵九店磚瓦廠的一座小型楚墓出土一組簡文內容類似秦簡《日書》的楚簡^⑩。1987年，在荊門市包山二號墓發現簡文內容分別為文書、卜筮祭禱和遺策等三類楚簡，共四百四十八枚，計一萬二千四百七十二字，保存基本完好，它是迄今發現楚簡數量最多，內容也是最豐富的^⑪。1986年5月至1987年6月，在江陵秦家嘴發掘四十九座楚墓中，有三座墓出土楚簡^⑫。一號墓出有殘簡七枚（段），內容為“祈福於王父”之類的卜筮祭禱之辭。十三號墓出土殘簡十八枚（段），簡文內容是“占之曰吉”等卜筮祭禱之辭。九十九號墓發現十六枚（段）竹簡，簡文內容分為兩類；一是“貞之吉，無咎”的卜筮祭禱之辭；二是少量遺策。1991年，在江陵鷄公山四十八號墓接近槨蓋板的填土中，出土一組簡文內容為遺策的楚簡^⑬。1992年，在湖北老河口市二座戰國墓各發現一組內容為遺策的楚簡。1993年，在湖北黃州市發現一組內容係遺策的楚簡。

從上所述，湖北有十四座戰國時期的楚墓發現了楚簡，其中多重槨槨的大、中型墓各三座，單槨單棺墓七座，單棺墓一座。這些墓出土竹簡的組數並不盡相同，荊門包山二號墓發現三大類六組竹簡，江陵天星觀一號墓與秦家嘴九十九號墓各出土兩組竹簡，其餘的十一座

墓都祇出土一組竹簡。各墓出土的竹簡數量也有差別，其中以多重棺槨大型墓的數量最多，多重棺槨中型墓次之，單槨單棺墓與單棺墓的數量較少。這些竹簡，除江陵鷄公山四十八號墓是放置於近槨蓋板的填土中，以及九店楚墓是置放於墓坑的壁龕裏之外；其餘十二座墓均放置於槨室內，一般都放置於邊箱，少數置於頭箱，未見放於棺裏，而包山二號墓是分東、南、西、北等四室放置的。

十四座墓出土的竹簡，祇有荊門包山二號墓與隨州曾侯乙墓發現的竹簡保存較好，並有不少整簡。鷄公山四十八號墓的竹簡因在填土中而保存較差，其餘的十一座均因槨室裏積水浮動與漆木器等器物的疊壓而殘缺較甚，僅有少數整簡，大多殘斷，有的殘長僅1厘米。這些竹簡的編繩均已腐朽，除其中包山二號墓的部分竹簡尚可大致復原其順序之外，其餘的竹簡已不清楚原來編聯的順序。由於絕大多數竹簡保存不好，出土時大多呈深褐色。

據初步觀察，這些竹簡從成竹劈破成條以後，還經過去節殺青，刮削整治等工序處理，絕大多數製作都較精緻。竹簡上均有三角形的小契口，用以固定編聯竹簡的絲綫。雖然絕大多數的竹簡已殘斷，但從整簡或簡上殘存的痕跡判斷，每枚竹簡上的小契口有上、中、下三個與上、下二個等兩種；而且上、下契口頭端與尾端都有一定的距離。幾組竹簡出土時，小契口上還殘存有絲綫，從絲綫上下兩字的間距較大分析，當時編聯成冊應是在簡文書寫之後完成的。這些竹簡上的文字，祇有包山二號墓的文書類竹簡與曾侯乙墓1號簡係墨書於篾青上的，其餘均墨書於篾黃上，而且，在竹簡的頭、尾端一般都不書寫文字。由於各墓出土竹簡的情況與各類簡文內容的不同，每枚竹簡的字數多寡有異，而且同一組竹簡或同一枚竹簡上字距疏密也並不完全一致。還有一些大、中型墓中出土的竹簡，簡文的筆法也不甚一致，係出自多人之手；當然，有些小型墓的竹簡，簡文卻是一人書寫的。

迄今湖北十四座墓發現的大批楚簡，為研究戰國時期楚國的簡冊制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實物資料。

二、簡文內容